

日美中安全对话的可能性

[日]秋山昌广

内容提要：基于对日美中三边关系以及三国现行国防政策的分析，本文认为，若三国的军费增长、军力重整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则东亚和平面临大国军备竞赛的潜在威胁，这使得日美中三边安全对话的必要性上升。另一方面，台湾问题有所缓和、各方对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地位取得初步共识，也使该对话的可能性上升。即使存在一些不利条件，但基于各国在加强安全互信和预防军备竞赛方面所具有的共同利益，中美日三国需要在建设安全机制，特别是日美中三边安全对话方面展开进一步的合作。

关键词：日美中、安全对话、安全互信

导 言

讨论日美关系，尤其是日美安保关系的论文和报告书有很多。本文不拟老生常谈地重复既有结论，而是希望从其他角度，即通过考察日美中安全对话的可能性来探究日美关系。

冷战终结于1990年前后（1989年，作为东西方对立标志的柏林墙倒塌），至今已将近20年了。在苏联刚解体的一段时间内，东西方关系迅速好转。但地处亚洲的中国依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保持了长时期的强劲增长。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中国威胁论”。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对于日本而言，与中国的关系都成为重要的课题。中日、中美关系在这20年中曲折前行，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冷战结束后，日美中三边安全对话的构想曾被多次提出，由学者、研究人员

[日]秋山昌广 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会长，日本防卫厅（现防卫省）前事务次官。

和舆论领袖参加的民间的三边对话也通过各种形式得以开展。但此类对话始终停留在民间层次上,而未上升到政府的层面,如1990年下半年,美国哈佛大学,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三方开始合作举行三国间的二轨对话。¹日美两国本来期待对话能够上升到政府级别,对话参加者当中有很多是前任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而中方参加者则基本上与中国政府没有直接关系,这是由于至少在当时中方对于政府级别的日美中安全对话还持消极态度。但是,据称现在中方对政府层次上的三国间对话也已开始抱有较大的兴趣。²本文拟从多个方面来考察日美中安全对话的可能性。

一、日美中三边安全对话的讨论背景

人们为什么会提出日美中三边安全对话的构想,并围绕此话题展开讨论呢?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日美中三国不仅在经济、贸易、人员往来、政治、地缘等领域关系密切,而且这种关系近年来正在不断加深。贸易方面,1990年的日中贸易额约为150亿美元,美中约为100亿美元,日美约为1390亿美元,而2007年它们分别扩大到2120亿、3030亿和2050亿美元。其中,日中和中美贸易关系发展尤为迅速。日本和美国分别是中国的第二和第一大出口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出口国(不包括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中国和美国又分别是日本的第一和第二出口国。由此可知,日美中三国互为其中一国的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³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日美中三国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行为体,日美中三国间关系的状态(简单来说就是好或者坏)对整个地区有巨大的影响。虽然该地区内的三边关系还有日美韩、日中韩、日美澳等,但日美中三边关系却可以说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别的三边关系。在日美韩和日美澳三边关系内,其成员都共享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观。而日中韩三边关系并不基于某种共有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地理上或历史上的传统联系。过去,包括韩国在内,三国还都共用汉字作为自己的文字。

不仅存在上述三边关系,近年来多边会议在该地区也很活跃,包括“东盟10+3”、东盟地区论坛(ARF)、上海合作组织等。前两者是东盟主导的以东南亚为中心的多边会议,后者是由中国主导的由亚欧大陆东部诸国组成的国际组织。ARF以实现区域内的安全为目的,现阶段的活动主要是各国间的意见交换,

1 此外还有由日本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以及不固定的中国的研究机构于1996年开始举行的“日美中二轨安全保障对话”。

2 《日本经济新闻》,2008年2月23日。

3 参见日本貿易振興會,“貿易統計データベース”,<http://www.jetro.go.jp/world/statistics/>; 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y 2008; U. 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tistics/>。

尚处于“建立信任措施”阶段。上海合作组织则是中俄两国为应对美国的单极压力，联合亚欧大陆东部的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共同创建的多边合作组织，目前的重要职能为促进各国在反恐政策上的合作。

以上述内容为背景，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日美中三边安全对话提议者的目的。尽管日美中三国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迅速提高，但三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不相同。虽然三国都不认为冷战时代所担忧的那种世界规模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但它们也不认为所有的安全问题都消解了。一方面，中国常常感到美国对自己构成了军事威胁，日美军事同盟是中国出入太平洋的一道巨大屏障。另一方面，美国同样也担心中国未来成为军事大国后，可能会与美国争夺霸权。日本虽然是世界级的经济大国，但考虑到中国可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迅速大国化，所以日本对中国也抱有很深的疑虑。日美关系则由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对北朝鲜的外交应对，以及驻日美军基地问题久拖不决等，使两国间的互不信任近年来有所增加。¹日美虽然是盟国，但其关系并非铁板一块。当前在日本国内，已有民间人士²及政治家提出下列观点，即如果美国对朝鲜过度纵容，那么日本便应该拥有核武器，也应该抑制来自朝鲜的导弹攻击。不过，两国目前都还承认日美同盟的价值，未来也还会继续强化日美同盟，而不会考虑弱化该同盟。

因此，日美中三边关系并非一种等边三角形的关系（三国相互间的政治距离相等），而基本上是日美对中国的等腰三角形的关系，日美之间的距离要近于两国与中国的距离。这样一来，日美中安全对话的目的之一便是，缓和日美两国和中国之间的对立关系，并通过这种缓和来确保各国自身的安全。如果三边安全对话能够成为一种常态，三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便可以增加，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也可以相应地减少。而日美澳、日美韩的三边关系中则不存在这样的要素。

日美中三边安全对话的另一目的是，在确保三国自身安全的同时，还能促进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本地区其他国家与亚洲经济大国日本、亚洲新兴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中国，以及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都是超级大国的美国均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若日美中三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恶化，这些国家将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可能会被迫卷入三国间的纷争。这意味着亚太各国的安全将会受到严重威胁。反之，日美中三国如能保持良好关系，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亚太各国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其他亚太国家，事实上也强烈期盼日美中三边关系的改善与友好。“东盟10+3”、ARF和上海合作组织，广义上都以确保成员国之间的和平为目标，但日美中三边合作还具有保障三国以外其他亚太国家安全的效果，这一点也非常特别。

1 読売新聞と米国ギャラップ社(Gallup),「日米共同世論調査」(日美联合舆论调查),2007年11月中旬实施,《读卖新闻》,2007年12月14日。

2 西部邁,「核武装論—当たり前をしようではないか」(核军备——迫在眉睫的选择?),講談社,2007年3月。

二、思考日美中三国关系的方法

此部分对本文考察日美中三国关系的方法加以简要介绍。

考察此问题，首先需要从三国各自的安全政策中找出与三国有关的政策，并对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

其次，由于在日美间的特别协商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日本的国防政策和防卫大纲，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之加以研究。再次，笔者将在详细考察日中安全对话、中美安全对话的内容的基础上，对三国都非常关心的重大课题——海洋军事战略——发表自己的见解。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最后将就日美中三国安全对话的可能性、有利条件、现阶段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以及日美中三国关系的前景发表自己的看法。

三、美国的国防政策

在日美中三国的国防政策中，以美国的国防政策最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因为它会以多种形式，在几年内陆续公开其国防战略。

在美国国防政策的相关文件中，让我们来考察一下2005年3月发表的《国防战略》¹和2006年2月发表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QDR)²提出了怎样的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

关于不断变化的安全形势，《国防战略》报告列出了几个重要事项。首先是与常规兵力有关的军事冲突划为传统挑战，其次是包括恐怖主义等在内的非传统挑战，再次是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灾难性挑战，最后是与生物武器和网络攻击有关的破坏性挑战。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美国除认为可能与中国发生常规军事冲突之外，还认为中国可能会对美国的薄弱环节发动生物武器或网络袭击，因此需要加强对中国的防范，而做出如此判断的理由，可以在2006年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中得到确认。

在2006年《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中，与打击恐怖主义网络、强化美国本土防御、防止敌对势力获取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并列，塑造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的政策选择也成为美国重要的国家安全目标之一。所谓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即那些有可能影响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未来安全态势的国家，包括中

1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March 2005, pp. 2-3.

2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February 6, 2006, pp. 19-35.

国。这类国家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建设性合作伙伴（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所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同时为了应对上述希望落空的情况，美国仍需要调整军事态势，努力维持本国军事力量的优势地位。这便是所谓“塑造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的政策选择”的内容。

如果以《四年防务审查报告》的内容为前提，则可知《国防战略》所列出的各种挑战中，与反恐相关的非传统挑战，以及与防止“无赖国家”使用核武器相关的灾难性挑战，都不涉及中国。但若从《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中有关“塑造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的政策选择”的内容来判断，则可以认为，在美国及其盟友所面临的传统挑战及破坏性挑战中，中国是被考虑在内的。

2008年6月，美国公布了其最新版的《国防战略》报告。¹新报告中，关于国家的防卫目标列举了以下内容：本土防卫、在与恐怖主义的长期斗争中获胜、促进安全、控制冲突，以及赢得美国正在进行中的战争。而在实现以上目标的手段中，就包括曾在2006年《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中出现的“塑造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的政策选择”。

四、中国和日本的国防政策

中国国防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和海洋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及国防现代化的步伐加快。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一目标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由于美军在上述两场战争中所表现出的信息化作战能力，被认为对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根据《2008年中国的国防》²白皮书，作为中国的国防政策，中国把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发展利益和保护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努力建设与国家安全和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三阶段发展战略是，2010年前打下坚实基础，2020年前基本实现机械化并使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目标。

此外，中国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在战略上坚持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高度重视危机遏制与战争预防，积极营造有利的安全环境。但需要提及的是，中国目前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都在追赶日本和美国，有可能在21世纪中叶超过日本和美国。

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June 2008, pp. 5-14.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8年中国的国防》，北京，2009年1月。

日本的国防政策，主要体现在1957年经内阁决定的《国防基本方针》¹和2004年经内阁决定的《防卫计划大纲》²中。

日本国防的基本目标，在《国防基本方针》中被表述为：将直接和间接侵略防患于未然；一旦侵略发生时，即予以反击并排除之，以保卫建立在民主主义基础上的日本的独立与和平。在《防卫计划大纲》中，日本的安全目标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防止发生对日本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并在威胁发生时将其排除；其次是改善国际安全环境，防止威胁波及日本，而实现以上目标的手段共有三种——日本自身的努力、与盟国的合作、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防卫大纲中涉及中国的内容主要出现于有关安全环境的说明部分：对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中国，在推进军事力量现代化的同时，正在谋求扩大其海洋活动范围，今后有必要继续关注这种动向。

对于日本而言，与同盟国的合作也就是与美国的合作，而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以及联合国等的合作。

比较三国的国防政策，可以得知，三国都将本国的防卫放在第一位来加以考虑，这可以说是非常自然的。为此，中国加强军队的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美国则在推展其全球战略的过程中，关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生物武器袭击、网络攻击以及新兴大国的崛起。而日本也对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开始将与本国防卫相关的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善作为自己的目标，明确提出自卫队活动范围的国际化。在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善方面，中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表达了积极的态度，而美国则将重点置于加强与同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合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仅从日美中三国各自的防卫政策中，是无法直接获知日美中三国安全合作的未来发展方向的。

五、日美协商

从2005年开始，日美两国主要就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协商。由于这一过程对日美中三边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笔者下面将稍微详细地对之加以讨论。

以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为标志，如何应对21世纪的新威胁——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成为一个重大课题。为此，美国自然要开始调整自己的国防政策和国防态势，与盟国日本就如何应对世界所面临的新的威胁进行协商。

在美日关系方面，作为美国调整其国防态势之一环，驻日美军的重组以及驻

1「国防の基本方針」，国防會議決定，閣議決定，1967年5月20日。

2「平成17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安全保障會議決定，閣議決定，2004年12月10日。

日美军基地的整合与缩小成为重大课题。同时，为应对后冷战时代的新威胁，也有必要重新讨论日本在维护亚太乃至世界安全中的作用。因此在安全领域，或者说在防卫政策领域，重新界定日美的分工，以及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分工就成为另一个重大课题。2002年12月，两国召开了“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2+2”会议），并就全面强化安全领域的日美协调达成一致意见。经过多轮事务级协商，2005年2月的日美“2+2”会议最终发表了作为第一阶段成果的“共同战略目标”。¹

“共同战略目标”中涉及该地区的要点包括：保障日本的安全、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促进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支援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向东南亚提供经济援助；涉及中国的内容包括：欢迎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建设性作用，并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促进台湾海峡两岸通过对话方式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督促中国提高军事领域的透明度；世界性目标则包括，促进民主主义等基本价值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支持国际维和行动、加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作用等。

由于“共同战略目标”涉及中国视为其内政问题的台湾问题，中国方面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这令笔者记忆犹新。“共同战略目标”中关于“促进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的内容本身，仅仅是再次确认日美双方的一贯立场，但中方对此抱有强烈的戒心。而且，中国的指责几乎不针对美国，而是集中在日本身上，这表明中国对日本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抱有疑虑。也就是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对日美两国使用了“双重标准”。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国方面非常担心——日美同盟的作用将不仅仅局限于保护日本一国的安全，日本会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对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施加影响。

2005年10月，作为日美协商第二阶段的成果，以日美两国在同盟内的分工、各自的任务和能力为主要内容的讨论结果公布。2006年5月，两国又发表了涉及美军兵力重组以及冲绳美军基地重组的第三阶段成果。2007年5月，作为两国五年来协商成果的总结，日美双方再次召开“2+2”会议，并发表了涵盖上述成果的文件——《同盟的变革：日美安保与防卫合作的进展》²，这份总结性文件除包括两国加强在导弹防御系统使用方面的合作以及共同促进该防御系统的发展外，还加入了加强日美澳安全合作、构筑两国与印度的伙伴关系、扩大日本与北约的合作范围等内容。其中涉及中国的部分为：促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提高军事透明度，以及在政策声明与行动之间保持一致等。文件没有涉及台湾问题。

在研究日美中三边关系的时候，充分了解上述一系列日美协商的过程及内容

1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共同発表，2005年2月19日，ワシントン。

2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共同発表，「同盟の变革：日米の安全保障及び防衛協力の進展」，2007年5月1日，ワシントン。

是非常必要的。正如前文所述,在防卫政策方面,日本并没有直接针对中国的具体政策,这一点与美国不同。日本不仅在《防卫大纲》中,在一般政策中也没有明确提出中国问题。在上述一系列日美协商中,两国协调了各自安全战略中的对华部分。换言之,日本接受了美国对华战略的许多内容,并以文本形式加以确认,这一行为本身便引人注目。除对华政策外,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也得以明确。同时,美国在日美同盟中的作用也进一步得到确认。

总之,日美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了两点一致意见:推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以及促使中国提高军事透明度。而以上两点在我们思考日美中三边关系时,将是非常重要的。

六、中美关系和日中关系

本部分将对涉及中国的两对双边关系进行考察。

在中美关系中,美方将人权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台湾问题及经济摩擦视为双边关系中的争论点,而中方则关注美国的单极霸权、对台出售武器,以及对华遏制政策。不过,由于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因此维持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对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对于美国来说,继续开拓规模庞大的中国市场同样也十分重要。美国不仅认为中国是其经济伙伴,而且力促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同时,正如前文所述,美国并未排除中国在未来成长为一个能与美国争霸的军事大国的可能性,因而也针对这一场景进行了准备。

另一方面,在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时,两国表示中美双方共同拥有广泛的战略利益,并愿意继续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两国的军事交流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包括各种双边政策对话、中国派遣军事观察员观摩美军演习,以及美中舰艇互访等。

中日关系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历史问题、与海洋管辖权相关的边界划定问题、领土问题、犯罪问题、东海资源开发问题、贸易摩擦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等。中日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很高,两国都希望日中关系稳步发展,但日本仍然担心中国未来可能成长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也就是一个霸权国。反过来,基于20世纪的历史经验,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也抱有深深的疑虑。同时,中国也对地处亚洲的日本追随美国的世界战略及外交政策有所不满。

另一方面,2007年,福田总理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也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此后,双方还就如何具体落实两国首脑提出的“战略互惠关系”,如何促进双边交流和增进相互信赖进行了协商,并实现了中日防务部门首脑级别官员的互访以及中日舰艇互访等。小泉时期停滞不前的双边军事交流近年来呈现出相当活跃的局面。

虽然日美关系中仍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双方在维持和强化日美同盟这一问题存在着基本的共识，因此此处不拟对日美关系做特别的说明。

七、海洋战略

谈到日美中三边关系，就不能不对三国海军目前的态势及其战略加以确认。以下将基于日本的防卫白皮书，¹对之分别加以说明。

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为117万吨，由860艘军舰组成，其目标是保卫中国的领土、领海，阻止敌国海军在中国近海的活动。中国海军的建设目标既包括阻止或慑止台湾独立，也包括获得、维持和保护中国的海洋权益，以及保护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虽然中国海军拥有860艘军舰，在舰艇总数上对日美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其总吨位却远逊于日美舰艇之和，这表明，中国海军舰艇中有许多是旧式的中小吨位的舰船。

美国海军的活动范围遍及全球，其中太平洋舰队拥有180艘军舰，总吨位达105万吨。它由负责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第七舰队，以及负责东太平洋和白令海的第三舰队组成，其中第七舰队在日美中三边关系中尤为重要。美国海军除了保卫领土外，还兼有保护美国国民（常住海外）、海上运输线、盟国，以及其他美国所认定的重要利益的任务。将盟国和海上运输线包括在海军力量使用的目标当中，并且在海外展开本国海军的军事力，这是美国海军的一大特征。

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150艘军舰，总吨位44万吨，目标是保卫日本的领土领海，尤其是日本的岛屿和海上交通线。根据日美安保体制，国防方面日本需要与美国共同作业。关于海上运输线的防卫，日本仍然维持着距离日本1000海里以外的海上交通线依靠美国来保卫的政策。但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开始给在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上的外国海军补给油品，由此可知，海上自卫队的国际化也在推进之中。

为了阻止台湾的独立，也由于中国希望将领土领海的防卫线推向第一岛链外的第二岛链边缘，中国海军近年来在西太平洋的活动相当活跃。美国已经针对此类活动加强了戒备，而日本对中国海军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也表示关注。

另外，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石油、粮食、资源的进口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中国也越来越重视海上运输线的防卫，并开始给在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上推行“珍珠链”战略。日美两国以及印度都对此加强了戒备。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海军的上述行为是加强本国国防和确保本国海上运输线安全的正常行为（该行为已被

¹ 防衛省，「平成20年版 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2008年9月5日，pp. 29, 51, 53-54, 172, 317。日本防卫白皮书中关于各国海军体制等部分，很多是参考了International Institute Strategic Studies编辑出版的*Military Balance 2008*和Jane's Information Group编辑出版的*Jane's Fighting Ships, 2007-2008*当中的内容。

拖延了很长时间),但由于此类行为迅速改变了既有的海上力量平衡,因此日美等国也加强了戒备。

八、日美中三国安全合作的可能性

从三国的国防政策以及日美间的安保协商中,我们无法直接找到日美中三国合作的政策。如考察近年来三国的海军战略,倒是可以发现,三国之间相互对立和相互戒备的状况不断加剧。与此同时,双边防卫交流和建立信任措施近年来也取得了一些进展。那么各方倡导的日美中三国安全合作,为何迟迟不能在政府层面上得到具体的讨论呢?

中国除了自身的国防,还要有效应对台湾问题,加之与日美两国相比,中国国防力量的发展又明显滞后,需要加大投入。在过去20年间,中国的国防开支每年都以10%至20%的速度攀升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同期日本的国防开支增长率几乎没有变化。目前政府发表的中国国防开支已经超过了日本的防卫预算。美国的国防开支在过去10年间也有急剧的增长,但这些增加的预算已经作为战费被用在了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上。

虽然日美双方都欢迎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一种负责任的、建设性的作用,也都将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作为本国重要的政策,但同时美国也已开始针对中国的军事大国化趋势进行相应的准备。中国则以经济快速发展所提升的综合国力为依托,在认识到军事力量相对落后的现实后,开始想改变现状,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面对这种情况,美国有可能增加国防预算,进一步推进军队的现代化,并特别以西太平洋为重点重新配置军力。而且,如果日本能够解决自身的财政问题,未来向扩大防卫预算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下文将列出迄今为止所提到的几个问题,并讨论是否存在解决之策。

第一,台湾地区问题对三国而言都非常重要。中国称这是自己的国内问题,但台湾地区方面并不这么看。由于台湾地区拥有不同于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和军队,在这个意义上,台湾地区问题并非一个纯粹的国内问题。美国则基于“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并且非常关心台湾地区的“国际地位”。不过,在目前,美国大力支持在台湾海峡维持现状。日本则由于早已放弃了关于台湾地区的任何请求权,现在与台湾地区并无任何法律上的特别关系,但由于对中国的戒备心理,国民中对台湾地区的同情有所加强。不管怎样,日美中三国都支持维持台海现状,也都希望通过对话方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因此,只要不发生具体的冲突,台海问题便可以“留给时间去解决”。也就是说,现阶段各方都认为,避免冲突是处理台海问题的有效策略。

第二,日中间的历史问题当然必须由日中双方来解决。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日益强大的状况,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要日中关系现在的

状况不发生大的变化,日本方面可以做到不提历史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的对日强硬运动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会逐渐淡化。但若中国的经济发展遭遇挫折,社会问题引发国家动荡,则历史问题的解决将变得更为困难。

第三,日本和美国都对中国的军力发展和军事态势的不透明性非常关注,这种状况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不利的,因为这种不透明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地区内的军备竞赛。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已经是一个明确的事实,但由于缺乏透明度,中国加强针对台湾地区的导弹部署,以及外空武器的发展等,反而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不好的结果。

第四,对于日本追随美国的外交及战略,中国心存不满并保持警惕。但关于日本的安全保障,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注意这种变化是很必要的。“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防备日本(Security against Japan)曾是一个重要课题。当时人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怎样防备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而在冷战时期,问题则变成了如何才能确保日本的安全,结果便是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冷战结束后,问题又变成了如何与日本合作,共同维护世界的安全。如果了解了这一发展趋势,那么认为现在的日本还在一味地追随美国的看法便是肤浅的了。在伊拉克战争中,日本最先给予美国支持,但日本也始终主张联合国参与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必要性,而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也开始回归联合国解决的方式。与日本合作,共同确保安全的观点,在此次日美协商的实施过程中也有所体现。

另一方面,让我们来看一下是否存在有利于实现日美中三边安全合作体制的要素。前文已经提到,以经济为中心,三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度非常之高,这使得三国也很希望能够维持彼此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

为了确保自身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日美中三国非常关心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非常期待日美中三国彼此间能够维持一种良好的关系。

此外,近年来日美中三边关系中的双边防务交流日益活跃,相互理解的程度有所提高。因为是政府部门间的交流,所以这种防务交流会不时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但至少最近一段时间内,三国政府部门间的良好关系得以维持。深化不同国家的国防部门间的信赖关系,是维持良好的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三国政府的政策宣示中并未提及日美中三边安全合作,但对于来自于民间的构想而言,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上述有利因素的存在。特别是,中国在政府层面上讨论此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实际上,关于此问题的最有力的启示体现于日美协商当中。作为2002年至2007年日美间一系列双边协商的最终成果,两国共同发表了题为《同盟的变革:日美安全保障与防卫合作》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促使中国在国际上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成为日美双方的共识之一。这一点在前述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也有所提及。佐利克副国务卿也曾提到过类似内容。由此可知,这一点已

经成为美日之间的共识。中国对于此点基本上也持欢迎态度。要想把三国间的这一共识转化为某种具体政策,那么我认为建设日美中三国安全合作机制便可能是答案之一。对于这一合作机制,亚太各国都会将之视为一个促进该地区和平与安定的架构而加以欢迎。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在国防白皮书中,不仅提到了军队信息化建设的三阶段发展战略,也将“积极营造有利的安全环境”作为政策目标之一。日本在防卫大纲中,同样也提到了“改善国际安全环境”。因此,并不仅仅是日美促使中国接受此建议,即使是从中国方面来看,成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也是其所追求的目标。

但是,如果各方之间互不信任,合作机制最终还是无法实现的。互不信任的原因有很多,不仅包括中国正在努力缩小其与美国之间的巨大的军备差距,且其军备增长速度很快,也包括美国作为超级军事大国推行其世界战略,且多将美国的国家利益置于首位,还包括日本虽然声称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但近年来依托日美同盟开始积极推进自卫队的海外活动,自卫队的目标也不再局限于对日本本土的防御,而是更加明确地表示要为世界的安全保障做贡献。这些行为均增加了日美中三国之间的不信任感,这便是当前的现状。

笔者认为,如果各方可以就各自的国防政策展开对话,逐步加深彼此之间的理解,那么这种互不信任是可以消除的。到那时候,日美两国便有必要接受中国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大国,即“负责任的大国”(该用语比“霸权国”这一用语要更好一些)了。美国常常被称作政治学上的正面意义的“帝国”,在这里美国也可以被称作“负责任的大国”。日本既不是帝国,也不是什么大国。考虑到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本经常要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这个因素,也可以说日本是个“负责任的大国”。所谓“负责任的大国”,指的是那些拥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能力(可能还包括强大的科技能力和价值观),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不仅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而且积极促进某一地区乃至世界安定与繁荣的国家。中国国力的增大如果是向上述意义的“负责任的大国”的方向推进,则日美不仅会承认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地位,也会认同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加。日美中三国应该以此为前提,建立起某种三国安全合作机制。

日美中三国安全机制不仅可以通过对话限制军备竞赛,实现各方在合理范围内的军备加强,而且也必将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冷战时代,不共戴天的美苏两国尚能在水面下展开诸多实质性的军备控制磋商,包括就“相互确保摧毁”理论达成一致,并缔结反弹道导弹条约等。而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中美之间,或者是特别与海军战略相关联的日美和中国之间,进行具有实际意义的军备管理谈判或者一般性对话,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进行的。况且,这种对话对于三国维护自身的安全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不负责任的军事大国化便意味着战争危险的迫近。

另外,如果我们从作为安全保障的一种形式的“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 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一问题,那么在我们前面已经反复提到的日美中三国经济与政治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三边关系已经不是一种恒常的敌对关系,而是一种非敌非友的关系。为了使这种非敌非友的国家关系保持稳定,推动三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是很有必要的。依据安全理论中的自由主义理论而非现实主义理论来制定国家的安全政策,是有可能的。笔者确信,日美中三国间的经常性对话、建立信任措施与安全合作,对于中国、日本、美国,以及所有其他国家来说,都将是一种有利的安全安排。

(李卓译,于铁军校)